

“延续”与“改变”

——论丁玲延安时期的报告文学

申朝晖,徐姝瑶

(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丁玲在延安时期的报告文学,不仅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也具有丁玲浓厚的个人色彩。丁玲的报告文学延续了小说创作中深切细腻的表现手法,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价值,读起来比较亲切、真实。同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丁玲对自身的要求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相契合,在文学创作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转向。报告文学渗透着丁玲的主体认同过程,体现了丁玲与“旧我”的撕裂,以及作为“党员作家”的自觉创作。丁玲的报告文学相较于她的小说更为明显地展现出了其创作立场、写作态度的转变。

关键词:丁玲;延安时期;报告文学;《讲话》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1)06-0080-06

王蒙评价丁玲:“她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1]98}李陀也说:“丁玲不简单。”^[2]如果只是把丁玲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后的创作称作是完全“政治化”的写作,那么就真的是抹杀了一个作家创作的自主性和思想的自觉性。从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丁玲,她切实明白“莎菲的困境”“娜拉走后的结局”,她是自觉地走向革命的道路,但这中间的过程是丁玲在心灵的炼狱和外界的熔炉双重作用下完成的自我蜕变。丁玲在延安经历了一个由“小说家”向“报告文学家”的转变,这不仅是文体上的转变,更是思想上的裂变与磨合。五四时期,丁玲的小说创作表达了丁玲思想上个人主义的困惑;左翼时期,丁玲的小说创作则经历了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分裂的矛盾;延安时期以《讲话》为分界点,丁玲经历了思想上与“旧我”的彻底撕裂,创作上的改变也显得艰难而又决绝。在《讲话》之前,丁玲以《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为代表的延安时期创作的小说,还带有着五四时期那种个人伤感式的表达,而以《田保霖》为标志的丁玲在《讲话》之后的报告文学创作,则坚实地体现了丁玲作为一个“党员作家”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为工

农兵写作。

一、“武将军”:延安时期成为“报告文学家”的丁玲

在抗日战争爆发的背景下,作家们纷纷寻找能够适应战时需要的文学形式来宣传抗战。在延安,报告文学作品就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地出现在报刊上,《大众文艺》《新中华报》《解放》周刊等刊物上都能见到反映抗战的报告文学作品。这一时期,延安的报告文学相比较诗歌和小说的作品数量还比较少,且主要集中反映战场的斗争及大后方军民一心支持抗战的主题,如雷加的《前线故事》、魏巍的《晋察冀英雄多》、柳青的《光荣的逃兵》、荒煤的《路》等作品。

在到达延安之前,丁玲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她的小说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烙印。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到左翼时期反对阶级压迫,丁玲敏感的思绪一直随着时代的脉动而起伏,这为她到延安从广袤的现实天地中汲取报告文学写作的素材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准备。丁玲1936年初到延安时,并不安心从事写作,而是随军到前线行动,在随军期间写

收稿日期:2021-07-07

作者简介:申朝晖(1972-),女,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延安文艺、陕西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学;徐姝瑶(1999-),女,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E-mail:1315354777@qq.com

下了一系列描写军队生活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1937年中华民族开始进入全面抗战,丁玲、吴奚如响应号召组建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在这一时期随军西战团,在前线搜集了一些写作素材,创作了《彭德怀速写》《到前线去》《警卫团生活一斑》等作品。从1936年到1938年,丁玲跟随大部队活动期间所作的通讯、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为宣传抗战。在艺术上,可以看出丁玲深厚的创作功底,但由于身处战时特殊时期,文章不免带有急就章的色彩。

报告文学在延安的繁荣,主要集中在《讲话》之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向作家提出了“为工农兵写作”的要求。大批作家开始把视线投向边区的劳动模范、工农兵干部、群众,在采访和大量收集真人真事材料的基础上,经过适当的技术加工,创作了大量的报告文学,如林风《一架机器的诞生》、曾克的《郭维德创造调解模范村》、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黄既的《关向应同志在病中》、荒煤的《模范党员申长林同志》、艾青的《养羊英雄刘占海》等作品。

丁玲在《讲话》之后的报告文学集中刻画了许多边区的工农兵模范,描绘了一幅幅陕北解放区的风景画。同时,丁玲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明显地展现出了与小说创作在写作立场、态度上的不同,创作了如《田保霖》《袁光发》《三日杂记》等报告文学作品。她左翼时期的《水》等作品中也有对工农兵群众的关注,但同样是对工农兵群众的关注,丁玲在报告文学中所显现出的立场、态度却出现了转变。甚至,丁玲延安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影响了其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张裕民、程仁这一类进步的工农兵群众和黑妮、董桂花、周月英这类女性形象。最起码,她是从写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开始认识这些不同性格的、充满生命力量的中国农民。1940年丁玲到边区文协工作,她后来真正为人们所称道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作品,也是导致她遭受批判、经受身心折磨的作品,正是在这一时期写成。在丁玲的文学立场上,这些作品对待环境、对待人物,还是带有知识分子强烈的启蒙立场。其实,丁玲创作这些作品的初衷也体现了她渴望在作品中塑造无产阶级革命者,如丁玲曾计划把《在医院中》的陆萍塑造成一个

“标准的共产党员”^[3],但这个共产党员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作品中总是难以下笔。按照丁玲的理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进步理论,但并不意味着这类知识分子就彻底改变了,他们“要完全脱去旧有的欣赏、趣味、情致是很难的”^{[4]67}。

所以,在《讲话》之后,丁玲的报告文学中写作态度、立场的鲜明转变并不是完全迎合政治的需求,而是作者在创作实践中,思想经历了复杂的蜕变后才有的成果,“为工农兵写作”的立场也是随着生活、创作的深入而逐渐明晰。

二、“一时之作”的反拨：丁玲报告文学的艺术性

谈及丁玲的创作,读者往往只注意到丁玲的小说创作,她的小说总能抓住主人公涌动的思绪,把读者的心紧紧地牵扯在她所塑造的人物身上。而她的报告文学却被当成是应和政治需求的“一时之作”。为什么王蒙说“历史已经删节掉了多少花絮——而丁玲的作品仍然活着”^{[1]97}。就丁玲自身而言,丁玲对《讲话》有着强烈的主体认同。丁玲的作品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的原因就在于,她把坚定的政治信仰与真挚的情感、较高的艺术水准做到了恰当的结合,并在不自觉中流露出来一些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报告文学即为文学,不是新闻,就表明报告文学之中存在作者的主观性表达。在丁玲的创作中,报告文学的创作是作者真正地深入生活,投入真情实感的创作。她的报告文学少了五四时期小说中那种阴郁的气质,表现出了清晰、明朗的氛围,但不能说这就不是丁玲,或丁玲变了个人,正是这种多面的、变化的创作构成了完整的丁玲。

茅盾在1937年所作《关于“报告文学”》中阐述了报告文学的主要性质,他除了指出报告文学应有报告的特点,也即“新闻性”之外,还指出报告文学描写人物、环境必须生动,“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5]。茅盾对报告文学的定义主要集中在“新闻性”和“艺术性”两方面,还指出了报告文学创作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关联性。由此出

发,就得以见出以小说创作起家的丁玲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优势。

丁玲到延安之后的报告文学创作,吸收了丁玲早期小说创作中描写人物、环境烘托的细腻手法,使她的报告文学作品鲜活而又生动。《到前线去》有许多精妙的环境描写,如“夜晚刮了很大的风,沙沙地打着糊紧了的纸窗”“无情的风总是扫着地上的砂土劈面打来”^{[6]36}并未描写战场,却已经让人感受到前线的紧张。还有《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等作品,虽篇幅短小,但作者用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了生动的人物形象,这已经可以显现出小说创作对丁玲报告文学写作潜移默化的影响。丁玲的《陕北风光》散文集里,描绘了陕北农民与陕北风情,笔法生动、引人入胜。其中,《三日杂记》是作者到陕北麻塔村考察妇女纺线情况所写的报告文学。五月的黄土高原在丁玲笔下清新、亮丽,与一群可爱的娃娃、纺线妇女相映成趣,有“见人就羞得把头低下去……跑开了又悄悄地望着人……等你不觉时猛然叫你一声来吓唬你”^{[6]158}的七岁少女金豆;不说话却“闪着有主张的坚定的眸子”^{[6]158}的纺线少女三姐;还有一群“笑得好厉害”“拿手蒙着脸笑”的妇女^{[6]158}。在丁玲笔下,这些女性无论是年轻还是年长,仿佛都不会疲惫,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记砖窑湾骡马大会》是作者到安塞难民纺织厂实地考察、收集材料写的一篇短文。作者抓住了陕北男女老少声韵情貌的特点,仿佛整个大会都跃然眼前。丁玲把这一时期描写陕北的散文都收进了《陕北风光》这个集子里,丁玲说《陕北风光》是“我走向新的开端”^{[7]51}。确实,丁玲后来所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杜晚香》等作品都能看到作者在描写陕北农民、妇女时的动人情感。丁玲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与小说交映成趣,小说创作的功力使她报告文学中的“新人们”焕发了神采。

报告文学以真人真事为材料进行创作。丁玲的报告文学少部分是根据见闻者的口述材料进行整理创作,绝大部分是丁玲亲自到边区调研、采访,有自己切实感受之后所作的文章。在丁玲的报告文学中记述了一个个鲜活的边区工农兵群众,其中的主角大多是边区的劳动英雄或是有先进性的工农兵干部,如田保霖、袁广发、李豁子等等。丁玲笔下的工农兵群众模范之所以典型、鲜活,与丁玲对

他们深入的语言描写和心理活动描写有关。这些工农兵群众模范的话语带有典范性质。田保霖说:“一切替老百姓想,只要于他们有益,他们就拥护,离了他们是办不了事的。”^{[6]155}袁广发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坐着吃。”^{[6]235}还有老村长说的话,都表达了老百姓对革命、劳动英雄的支持:“革命给了我好日子,我就听革命的话。劳动英雄是好人,他的号召也不会错。”^{[6]162}这些由人物直接表述出的话对塑造工农兵的先进性、模范性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在群众中也有号召和带头作用。除了人物直接表述出的话之外,人物还有大量的心理活动。丁玲的小说在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时,以揭开“人物心灵的隐秘之处”“分析人物的精神矛盾”^{[8]259}见长。在丁玲的报告文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是体现人物的思想从旧到新的质的表现,小说中人物心理的矛盾状态,在报告文学中变成了对党的认知模糊到信仰坚定的渐进过程。《民间艺人李卜》中李卜的心理活动,“他认识到他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为了大家,为了所有受苦人的幸福”^{[6]232}。《田保霖》中田保霖有许多“盘算”,诸如“共产党还不错,可是,咱就过咱的日子吧”^{[6]151}“他们(参议会)活着不为别的,就只盘算如何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6]152}。这是作家由人物行为延伸出的带有了作家自己感情色彩的话语表述,与人物进行灵魂沟通的结果。丁玲认为写作要了解每一个人,要与人们共同战斗,作家才能将所见所闻更生动地写出来,达到与人物真正地“互通声息,互相交织”^{[6]151}。在丁玲的报告文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是作者根据人物的行动线而推测出的,细腻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转变不生涩,而是更加真实、鲜活。心理描写手法在丁玲的小说里运用较多,但小说是以虚构为主,而报告文学的创作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丁玲将小说创作中细腻的心理描写运用到报告文学的创作中去,使人物的发展与心理活动相吻合,故事更加真实、生动。心理活动虽具有虚构性,但这种与人物发展相吻合的心理活动,却增加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

报告文学以事实为基础,讲求客观理性,但作者对材料叙述角度却体现了作者的立场、态度,以及透过事件所要说明的问题。丁玲的报告文学中,很多主人公都有一个“成长史”,从落后到进步,从认知模糊到信仰坚定,许多事件发展也是从不完善

到完善。丁玲的《田保霖》是歌颂边区劳动英雄田保霖的一篇报告文学,当时受到了毛泽东的致信鼓励,和她一起受到鼓励的,还有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这两篇报告文学涉及的两个主要人物都是田保霖和邹老婆子。在欧阳山的笔下,邹老婆子是个穷苦人,田保霖在文中第一次出场就是“靖边新城区民办合作社的主任,又是三边的合作英雄”^[9]⁴²⁶⁷,邹老婆子是在合作社主任田保霖帮助下得以生活的穷苦人。欧阳山主要是赞扬边区主任田保霖热心帮助受苦群众的高尚品德。丁玲的《田保霖》中,田保霖通过与群众的交往,以及工农干部惠中权对他的帮助,由一个“曾经向神父磕了八年头”“少管闲事”的买卖人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热心为老百姓服务的合作社主任。邹老婆子是田保霖“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辅助人物。丁玲着重强调了一个边区劳动英雄的成长离不开共产党和群众的帮助。在丁玲的另一篇报告文学《民间艺人李卜》中,李卜由一个“抽大烟”的戏子在民众剧团柯仲平同志的帮助下转变为了既戒了大烟又热心给年轻人教戏的文教会代表。这与《白毛女》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叙述相类似。丁玲报告文学叙事的“成长模式”在《袁广发》等作品中也有体现。丁玲用“成长史”来叙述故事,意图表现在成长的过程中,共产党新政权的帮助与群众拥护的重要性,以及人物应当成长为对党有着坚定信念的英雄人物。这种成长模式在丁玲晚年的报告文学《杜晚香》中也有体现,杜晚香也是由一个农村的劳动妇女最终变成了一个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在她的小说中,这种“成长”的叙述角度也有体现,但理论与实践的不完善使丁玲无法按预期安排人物的发展,如《在医院中》的主人公陆萍。而在报告文学中,丁玲借由这些真实的事件和人物,完成了丁玲在小说叙事中没有完成的“成长”。不仅如此,“成长模式”的叙述角度使丁玲的报告文学有了故事性,不会使工农兵模范的事迹变成单纯的说教,而变得充满了循循善诱的教育意义。

在创作手法方面,丁玲的小说创作影响了丁玲报告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增添了丁玲报告文学的可读性。在思想深度上,丁玲早期的文学活动与《讲话》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了丁玲报告文学以及丁玲文艺观、世界观的内在转变。

三、主体认同:《讲话》促进丁玲报告文学的内在转变

丁玲的报告文学延续了小说的创作手法,但与小说相比,报告文学却体现出了丁玲在文学立场、态度上的转变。丁玲在延安时期写报告文学,一方面是报告文学能够在战时发挥宣传抗战的作用,另一方面报告文学也成为丁玲在紧张的政治审查中发声证明自己的工具。丁玲作为《讲话》的亲历者,乃至受益者和后来的捍卫者,《讲话》深刻地影响了丁玲从1942年到晚年复出文坛后的文艺观、世界观、文学创作,由内到外地把丁玲由“文小姐”变成了“武将军”。

在1943年之前,“反党”“反革命”“叛徒”的帽子还一直扣在丁玲头上。党内对丁玲的政治审查,以及《“三八节”有感》等作品给丁玲带去的舆论压力,使丁玲在一个时期内心情郁结。《萧军日记》里记述到丁玲此时的遭遇:“这是一个使徒的折磨”^[10],这是丁玲所不能忍受的,丁玲渴望用新的创作来证明自己。直到1943年12月,丁玲南京被捕时期的审查问题才告一段落。1944年到1945年,丁玲才下乡开始了新的创作。在丁玲还接受审查期间,1943年的3月份,艾青、萧三、赛克、荒煤等作家就开始下乡采集素材,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作品,这对丁玲来说是莫大的煎熬。在胡乔木的鼓励下,丁玲重新开始了报告文学的创作,报告文学没有杂文那么激烈的批判色彩,可以避免出现《“三八节”有感》发表之后出现的现象。更重要地是,下乡采集工农兵模范的事迹,深入工农兵的生活能更好地实践毛主席《讲话》中提出的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人”的问题。《三日杂记》为开端的丁玲的报告文学创作,是丁玲对《讲话》精神实践的开始。《袁广发》《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一系列丁玲在《讲话》后的报告文学写作,逐渐改变了作家的写作态度、立场。《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给丁玲带去的政治、舆论压力,丁玲要借报告文学中那些工农兵模范表明自己的态度,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在《民间艺人李卜》结尾处,丁玲说:“他本来是一个民间的艺人……现在呢,他是一个革命的群众艺术家,积极地工作着。”^[6]²³³在《袁广发》的结尾处也有“因

为他一心向党,不怕艰苦”^{[6]245}。《田保霖》等作品结尾处,丁玲也赞扬工农兵群众模范优良的品质。丁玲对工农兵模范的评价其实也是代表了丁玲自己的立场,正如她在《讲一点心里话》中说的:“我的行为,我所做的事,一定要像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你的脑子里,把刺在我脸上的两个字抹掉。要在你的心里,生出新的东西:‘她是一个共产党员。’”^{[11]66}延安时期,作家们写报告文学是为了响应号召报告模范的先进事迹,而丁玲却有了第二层,她要告诉别人,“她是一个党员,也是一个作家”“她不是右派”。《讲话》里要求作家应当成为一个“党员作家”,这正好是丁玲透过报告文学极力想证明的。

报告文学要求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丁玲在《讲话》之前的报告文学创作,怀揣着丁玲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她要用报告文学去记述战场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自抗战爆发,许多文艺工作者自发地将拯救民族危亡作为自己的创作责任。这一时期丁玲的报告文学是整个抗战文学洪流中的一部分,它表达了丁玲对民族、对国家的热血,展现了丁玲报告文学的战斗性。《讲话》之后,丁玲受“为工农兵写作”的号召影响,写下了一大批描写边区劳动模范和工农兵群众的报告文学。与《我在霞村的时候》那些麻木的看客、《在医院中》那些七嘴八舌议论是非的闲人相比,丁玲报告文学中的工农兵群众朴实可爱、待人真诚。《三日杂记》《袁广发》《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报告文学,都是丁玲亲自考察农村,与工农兵群众的交谈、与农村妇女“睡在一条炕上”聊出来的,是认识了他们每一个人以后写出来的。从《讲话》开始响应号召,到与农民深切交往后带着真情实感写作,丁玲的报告文学不是简单的政治的传声筒,而是贯彻着丁玲思想的蜕变,是她复杂的创作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来看,从五四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虽然丁玲小说中的革命意味愈来愈强烈,但在革命的主基调下总是渗透着作家的启蒙、批判与反思的思想意识。丁玲的报告文学少了其小说中特有的启蒙色彩,但她的报告文学改变了丁玲前期小说中对农民和土地的叙事态度,使得丁玲在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中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转变。在《讲话》的影响下,丁玲的报告文学更注重普及的意义,这不仅是政治的要求,

而是丁玲从实际生活中摄取的经验。“为工农兵服务”在丁玲的笔下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工农兵群众,是作者投入真情实感的心灵之歌。丁玲的五四思想到延安落土所要经历的磨合,在丁玲的小说向报告文学的转变中可以见出,磨合的结果首先就体现在丁玲的报告文学中。丁玲《讲话》后的报告文学是遵循《讲话》精神具有普及意义的范本,《讲话》深深影响了丁玲的报告文学创作,丁玲的报告文学创作更促进了丁玲文艺观、世界观的内在转变。

丁玲在建国后担任文艺界领导人以及晚年复出文坛后的多个场合都表达过《讲话》对于文艺工作者、文艺工作的重大意义。在80年代,西方文艺思潮漫卷中国文坛,而丁玲在此时依然高举《讲话》的旗帜。由此可见,《讲话》对丁玲的影响极其深远,《讲话》使丁玲明确了自己坚持和相信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从左翼时期开始萌芽,到《讲话》之后终于结出了果实。因此,毛主席称丁玲的《田保霖》开始了“新写作作风”^{[12]194}。丁玲却不认为《田保霖》是自己写工农兵的开始,她认为自己早在《水》等作品中就开始写工人、农民了。只不过,左翼时期的丁玲没有农村的生活经历,不了解农民真实的状况,所以,丁玲笔下的农民没有鲜明的性格特征,没有展现农村社会冲突的丰富与复杂。从左翼时期作为群体出现的群众到延安时期笔下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工农兵形象,生活对于创作的意义,丁玲一直都明白。《讲话》让丁玲更加明确了创作不仅是源于生活,更要深入生活。丁玲笔下的莎菲、贞贞、陆萍等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有很强的虚构性,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多多少少也能找到其原型。而丁玲的报告文学则是以真实的材料为依据,丁玲对笔下的事件、人物有绝对的了解。她在创作报告文学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表达上的困难。如写《十八个》《二十把板斧》时所用的是别人提供的素材,文章写出来之后,丁玲觉得对材料中的生活不熟悉,写得没有别人讲得动人。《田保霖》写出来之后,丁玲也不觉得好,因为不是深入生活的东西^{[13]285}。随着丁玲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她发觉自己“已经不单是为完成任务而写作了,而是带着对人物对生活都有了浓厚的感情”^{[7]52}。延安时期丁玲的报告文学创作,尤其是

实践了《讲话》精神的一系列表现工农兵的报告文学作品,是丁玲用“身”和“心”一起感受生活、深入群众的创作成果。延安时期的下乡到“北大荒”的实践,丁玲了解她笔下的工农兵群众,体会到了“为工农兵写作”不是一句空话,所以她笔下的故事读来从不空洞,人物性格鲜明生动,这也就是丁玲一直坚守《讲话》的原因。

丁玲的报告文学是延安时期报告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小说创作起家的丁玲将小说的“美”赋予了她的报告文学,这也是丁玲报告文学的独特性。同时,她的报告文学相较于她小说创作时的立场、态度发生了转变,她与笔下的人物由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变成了同行者。丁玲延安时期的报告文学表明了丁玲的文学立场、政治态度,她要用事实向人们证明自己的党员作家立场,从未改变且更加深刻。丁玲从报告文学开始实践《讲话》精神,经过长时间的实践与改造,《讲话》内化成为了丁玲文学观的一部分。《讲话》没有使丁玲成为完全政治化的作家,而使丁玲的创作在广大的生活、社会中更有战斗的力量。延安时期,不仅是丁玲,柳青、荒煤等作家在延安也创作了许多反映时代风貌的报告文学作品。他们的报告文学创作丰富了延安时期报告文学的景观,推动了报告文学在抗战文艺中深入地发展,用报告文学的力量深化了人民文艺的立场。

参 考 文 献

- [1] 王蒙. 我心目中的丁玲[J]. 读书, 1997(2): 88-98.
- [2] 李陀. 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J]. 北京文学, 1998(7): 29-39.
- [3] 王增如, 李向东. 读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7(6): 115-124.
- [4] 丁玲. 丁玲全集: 第7集[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 [5] 茅盾. 关于“报告文学”[J]. 中流, 1937, 1(11).
- [6] 丁玲. 丁玲全集: 第5集[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 [7] 丁玲. 丁玲全集: 第9集[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 [8] 王中忱, 尚侠. 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2.
- [9] 欧阳山. 欧阳山文集: 第10卷[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8.
- [10] 萧军. 萧军日记(1940)[J]. 新文学史料, 2007(3): 4-42, 封3.
- [11] 丁玲. 丁玲全集: 第8集[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 [12] 毛泽东. 给丁玲、欧阳山的信[M]//毛泽东书信选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13] 丁玲. 丁玲全集: 第10集[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Continuation” and “Change”

——On Ding Ling's reportage in Yan'an period

SHEN Zhao-hui, XU Shu-y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Yan'an University, Yan'an 716000, China)

Abstract: Ding Ling's reportage in Yan'an period not only reflects the social style of a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but also her strong personal color. Ding Ling's reportage continues the deep and delicate techniques of literary expression in her novel creation and shows a unique artistic value, which is more cordial and real to read. Meanwhile, after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Ding Ling's requirements of herself agree with the spirit of *Speech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she veers in literary creation to a certain degree. Ding Ling's reportage with the process of her subject identification reflects her departure from “old self” and also her conscious creation as a “Party member writer”. Compared with her novels, Ding Ling's reportage shows her changes of writing stance and writing attitude apparently.

Key words: Ding Ling; Yan'an period; reportage

【编辑 王思齐】